

先秦两汉

岭南建筑研究

曹劲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

曹 劲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空间性视野下对岭南地区考古发现中的建筑遗迹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并通过整体建筑文化历时性意义分析,初步建立了史前至两汉期间岭南早期建筑起源和发展的框架。这是对该阶段岭南建筑在多样化基础上,以异质能动姿态日渐走向稳定发展过程的深度梳理与探讨。基本上,这是建筑在岭南特殊空间性中滥觞并形塑出基本特色后,反过来中介、巩固地域性发展,并进一步与中原和周边地区等外来文化相互对话、交融,而产生新的文化、建筑的空间的一段发展历程。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学师生、文物保护工作者参考的学术论著,也适用于对建筑历史有浓厚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 / 曹劲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3276-2

I. 先… II. 曹… III. ①古建筑—文化—研究—广东省—先秦时代
②古建筑—文化—研究—广东省—两汉时代(前 202~220) IV. 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375 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杨明远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3/4

印数: 1—1 800 字数: 450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及独特轨迹	(1)
1. 时空界定	(2)
2. 回顾及省思	(4)
3. 研究方法	(7)
二、岭南早期建筑的地域特质和编年依据	(14)
1. 岭南异质地域的历史发展轨迹	(15)
2. 岭南早期建筑分期的考古实证	(17)
三、岭南早期建筑书写的现实意义	(21)
1. 自然地理与建筑形制的渊源	(22)
2. 文化交汇的袅绕余韵	(24)
3. 历史遗构的全新视野	(25)
四、本章小结	(27)
第二章 石器时代的岭南洞穴与巢居	(28)
一、来自建筑考古学的启示	(28)
二、五岭之南的远古时代	(31)
1. 岭南的旧石器时代	(33)
2. 岭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37)
3. 洞穴遗址的分布	(37)
三、洞穴遗址的建筑学观察	(38)
1. 择址分析	(38)
2. 洞穴空间的原始区划	(41)
3. 功能衍生与生活建构	(42)
四、虚实之间的领域指认	(44)
五、赤铁矿遗迹遥指的神圣空间残影	(45)
六、巢居——洞穴之外的歧异发展	(47)

1. 问题的提出	(47)
2. 富有启发性的可能性案例	(48)
3. 槽巢和窝棚——原始营造的发端	(49)
七、本章小结	(54)
第三章 定栖山岗的农生聚落与居所建构	(56)
一、山岗遗址的分布地志及其社会文化演进意义	(56)
二、走出洞穴后的原始农业生活文明	(58)
三、聚落世界及其宇宙对应	(62)
1. 聚落建构的空间和社会意义	(62)
2. 聚落可能的功能分化	(64)
3. 聚落可能的宇宙对应	(71)
四、部落社会及其屋舍建构	(72)
1. 石峡遗址的木骨泥墙长屋	(73)
2. 鲶鱼转半地穴建筑遗址	(79)
3. 走马岗半地穴建筑遗址	(80)
4. 香港元朗虎地凹地面式建筑遗址	(81)
5. 广西晓锦遗址干栏建筑遗迹	(83)
五、储藏与归葬	(84)
1. 陶器——来自泥土的恩典	(84)
2. “入土为安”的归葬	(85)
六、图腾与象征	(86)
1. 点与线的刻画	(87)
2. 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	(87)
3. 质朴纹样的美感积淀	(88)
七、本章小结	(88)
第四章 贝丘和沙丘的滨海聚落与建筑营构	(91)
一、贝丘与沙丘遗址的领域分布及空间意义	(91)
1. 贝丘遗址的分布及生活世界建构	(95)
2. 沙丘遗址的分布及生活世界建构	(96)
二、以洋海贝食为滋养的集体社会空间架构	(98)
1. 贝丘居民的生计	(98)

2. 沙丘居民的生计	(99)
3. 贝丘和沙丘遗址的聚落特点	(101)
三、干栏、陆筑及其彰显的动静空间反转	(106)
1. 滨水干栏长屋	(106)
2. 坡地干栏	(113)
3. 平地起建的居址	(119)
4. 以烧灶为中心的户外生活空间建构	(127)
5. 动静辉映的空间美学	(128)
6. 关于建筑形态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129)
四、舟楫和水上生活空间	(134)
1. 海岛上的神秘岩画	(134)
2. 聚落里的神圣空间	(137)
3. 地域美学图像	(139)
4. 动态空间认知	(140)
五、空间体验及建筑美的呈显	(141)
六、本章小结	(143)

第五章 青铜时代的岭南方国及其空间实践

(145)

一、古国作为史籍传说中的岭南空间历史阶段	(145)
二、以“国”为界的空间地域划分	(148)
1. 青铜文化的鼎盛与方国文明的出现	(149)
2. 南越诸小国与中原文化	(152)
三、阶级与空间之社会区隔	(155)
1. 横岭山墓地的等级与性别的空间分化	(155)
2. 石峡墓葬所体现的阶级分化	(157)
四、宫室的出现及其华美走向	(157)
1. “宫室”的由来和发展	(157)
2. 岭南宫室建筑的华美残影	(159)
五、民居建筑传统的稳定性	(160)
1. 聚落遗址中的讯息	(161)
2. 本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共存	(162)
六、本章小结	(162)

第六章 秦汉时期岭南建筑的飞跃发展	(164)
一、从南越国到南海诸郡	(166)
二、要道、城池：攻防与统治	(168)
1. 岭南所发现的代表性城池	(172)
2. 攻防与统治意旨的体现	(175)
三、取法中原礼制、兼纳地域文化的都城建构	(178)
1. 考古发掘和史料辩证下的南越王都城	(178)
2. 效仿汉廷的南越国政治体系和都城规划	(181)
3. 内城外郭、郭外有墓葬区和郊野的都城建构	(185)
4. 在地海洋文化对南越国都城空间性形塑的影响	(190)
四、华美宫室：地方统治生活及号令中心	(192)
1. 谨严恢宏的南越王宫殿	(192)
2. 气势雄伟的行宫：五华狮雄山“长乐台”	(202)
3. 布局山岗的官署：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	(206)
五、曲水流觞的赏玩宴乐与苑囿建筑	(208)
1. 宫苑遗址现状	(208)
2. 造园手法蠡测	(210)
3. 低支架的干栏宫殿	(217)
4. 苑中的政治和生活空间	(222)
5. 南越王宫苑遗址的园林史学意义	(225)
六、山野洋海中的劳动生产与空间营造	(226)
1. 民居陶屋的主要类型	(227)
2. 结构与装饰	(236)
3. 发展与衍变的内在机制	(240)
七、等级分明、汉越杂糅的陵墓建筑	(242)
1. 凿山为藏的南越王石构陵墓	(243)
2. 大型木椁墓和成熟的木构技术	(251)
3. 砖室墓和砖构及穹隆技术	(260)
八、岭南地域文化在空间、建筑上遗韵悠长	(266)
九、本章小结	(269)

结语	(272)
一、岭南早期建筑文化的特色	(275)
1. 孕育于山海之间、源远流长的地域传统	(275)
2. 兼容、深化多元文化的开放性	(275)
3. 务实因应政治社会转型的嬗变作风	(276)
二、建议和展望	(277)
1. 历史事实的发掘与历史现场的重建	(277)
2. 空间意义的追索：重视社会文化脉络的空间性诠释视野	(278)
参考书目	(281)
后记	(288)

第一章 导 论

——岭南早期建筑的史学构建及其意义

人类假如想看到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限苍穹，只要看看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灭亡的世界古代文化就足够。

——西拉姆著《神祇·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年

一、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及独特轨迹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说：考古学如同望远镜扩大了天文学家的视野一样，扩大了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像显微镜为生物学发现的巨大的有机体外表隐藏着最微小的细胞生命一样，改变着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在岭南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漫长的生活和生产历史，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赞誉这里是“真正的南方”，是探索古代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一把钥匙”^①。岭南早期建筑作为岭南文化这一特殊文明的构成元素之一，其发轫、过程、底蕴和模式亦有其独特轨迹。但是，史料的匮乏和实物的湮灭，使我们长期以来对建筑的早期形态这一问题处于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近年来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使我们有了第一手的研究对象，而建筑考古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成熟亦使我们有能力认识和分析这些资料，从而追踪岭南早期建筑发展的轨迹。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论文集》一书序言中指出：“中国南部考古起步较北方为晚，在过去又由于传统史学重中原轻边疆的偏见而被忽视，所以考古与古史研究成果不如华北，近年来，部分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考古材料出土增加。南方各省的考古文化单位，包括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内，又有计划、有目的地扩大了调查发掘的规模和范围，发现了许多引起国内国外密切注意的新资料与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岭南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早期聚落遗址的不断发现，随着河宕、村头、石峡、宝镜湾等大型聚落遗址的揭露和发掘，使我们在聚落考古的理论框架下展开对早期人类居址的进一步研究，对山岗遗址、台地遗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

址,尤其是沙丘和贝丘遗址的聚落形态特点认识不断修正和深化;其次是随着学科建设的成熟,已往发掘中常常被忽视的早期建筑遗迹被纳为重要的考古发掘对象,房屋遗迹的找寻和考察成为有意识的工作重点。自史前至两汉之间,从半地穴式建筑、地面式建筑,到滨水和山地的干栏式建筑;从数十平方的小型居址,40多米长的木骨泥墙长屋,到南越王的宫殿苑囿,都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这一切,使得岭南建筑起源、肇生和发展的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课题。

1. 时空界定

对本书中时间和区域的边界在此先做解释和界定。

(1) 历史时期的限定

本书所选取的“先秦两汉”,是容易引起疑问的限定,因而是首先必须给予明确的说明。这不是一个静态、片断的历史时期概念,而是指涉旧石器时代以迄两汉时期的时间发展限断,具有时间演变之整体性意涵。在此一阶段内,岭南建筑从起源、发生和发展而臻于成熟。

迄今发现的岭南原始先民最早的居住遗址是大约生活在12.9万年前的马坝人所栖身的天然洞穴。在两广地区的洞穴考古发现,证明除了马坝之外,粤北、粤西及广西北部的石灰岩地区一直有住在山地穴洞的先民。

约在距今10000年以前,岭南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扩大至渔牧农耕,生活区域扩大至江海之滨以及平原、丘陵地带,出现了适于定居生活的半地穴式、地面和干栏式房屋建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海岛与内陆已然形成对比鲜明的文化分野。多种多样的聚落形态,穴居与巢居系统并存的各类居址,使我们在一次次惊喜中逐渐对史前建筑有了直观的认识。

约在距今3500年前,岭南社会进入青铜时代,本期已出现面积较大的定居聚落,如东莞村头、珠海宝镜湾等,这些重要遗址应该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不仅有木骨泥墙长屋或干栏的居址等发现,还显示出这一时期,聚落已经有居住区、公共活动广场和墓葬区的划分。岭南成为百越族群开始组构雏形邦国的聚居地,从青铜文化的发达程度观察,约当于中原的东周后期,广东地区的越人已建立了一些土邦小国,其中多数国家形态可能还没有发育得很充分。

直至秦汉,岭南建筑才真正形成稳定全面的风格。秦平岭南以至汉代,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文化与建筑技术。其间南越王赵佗建立南越国,奉行民族和睦政策,岭南得到开发。先后作为南海郡治和南越国都的番禺城(今广州市),成为中国当时的著名都会之一。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同时出现第一个建筑高潮。广州秦汉墓葬出土的

陶屋模型、五华狮雄山和广州市内发掘的南越王宫苑遗址、广东省内发现的大量汉代城址和建筑遗址以及出土的瓦当、柱础、栏板等建筑构件，都充分表明，岭南建筑体系至汉代已经基本形成而成为后世建筑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本书选择史前至两汉的建筑考古成就来作为研究的时域范围，以建构岭南早期建筑发展的脉络框架。

(2) 地域的界定

自然地理学认为岭南地区是中国最南方，包括大陆与岛屿两部分。通常人们认为大陆部分包括广西和广东两省，岛屿部分包括海南岛、沿海诸岛和南海诸岛（图 1-1）。岭南地跨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处于中国丰水地带，汛期长达半年以上。气候与降水直接关系到食物的品种布局与人类的饮食结构，甚至左右了古代文化的面貌与特征。



图 1-1 岭南地域范围

1. 福州；2. 广州；3. 韶关；4. 桂林；5. 南宁

（引自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

背靠五岭，面向南海；既封闭，又开放。在这种地理格局大背景下形成了岭南复杂的地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的基本特征是山地丘陵众多，占全区陆路面积的 80%，平原和盆地的面积一般不大。广东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5.3%，主要分布在粤北、粤东和粤西的内陆地区；丘陵和台地分别占 27.4% 和 13.7%，分布在沿海一带；平原占 23.4%，以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最大；还有长达 3256 公里的漫长的

海岸线和众多的港湾,港湾伸入大陆内部,形成不少优良港湾和适于人类居住的地点。沿海河流成网,形成三大水系,即由北江、西江、东江组成的珠江水系,由梅江和汀江组成的韩江水系,以及数目虽多而互不关联的沿海水系。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其基本地势为南部较北部为高,岛南为五指山地,北部为丘陵、台地。全岛有1470多公里海岸,有南渡江、昌化江和万泉河为主的百余条河流。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四季不明显,受季风和台风的影响严重。岩石经风化后形成深厚的红色风化壳,在此基础上,土壤发育成热带湿热的砖红壤。土体中的原生矿物受到强烈分解为铁铝聚积,土壤呈强酸性反映。因此,岭南的考古发掘很少在墓葬中见到人类和动物骨骼的遗骸,只有在丰厚的贝壳堆积中这些遗骸才能得以保存^①。

背山面海的大格局,复杂的自然地域条件,不仅孕生了岭南多样而独特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影响了岭南建筑形制的多元化发展,是研究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为初阶的历史早期需特别重视的因素。

2. 回顾及省思

迄今为止,对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主要来自三个领域,一是建筑史学界,二是考古学界,三是历史地理学界。

(1) 岭南早期建筑研究成果综述

陈泽泓先生的《岭南建筑志》是一本通志体例的岭南建筑史,结合考古发现和史料,对岭南建筑的起源和发展作了较完整的综述。邓其生教授的《岭南早期建筑发展概观》一文“以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为据,探索岭南建筑的萌芽和发展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岭南的地域特点和历史机缘的原因,早期建筑的发展就走过了—条不寻常的路,且具有初步的特色”,简述了岭南建筑生成、演进、嬗变的过程,及其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征。

刘致平先生的《中国居住简史》和林会承先生的《先秦时期中国居住建筑》在涉及早期建筑的部分,对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有简要介绍。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的《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及《广州汉墓》则全面地展示了汉墓中出土的陶屋建筑模型。这些著述从陶屋的平、立面布局及空间组织等方面归纳了岭南汉代居宅可能的形制及发展概况,对岭南两汉时期住宅建筑形象有了大致的勾勒,但均未能展开深入性的探讨。

华南理工大学吴隽宇的硕士论文《广东古越族居住建筑文化初探》对先秦时期岭

^①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

南百越民族的民居特别是干栏式建筑的发生和演变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综合考古发现的陶屋资料,对于秦汉岭南民居建筑的发展面貌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邱立诚先生对在田野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韩江流域两处汉代遗址的比较研究》、《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粤闽地区汉代建筑遗址的研究》及《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等著述是来自考古学界的工作实践和认识,对岭南汉代建筑的研究有第一手资料的史料学意义。

近年来,为配合市区内的经济建设工程,广州市开展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使部分南越国时期的地下文物史迹重见天日,如南越国文王墓、南越国宫苑遗址、南越国1号宫殿与食水井、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这些考古材料为研究岭南秦汉建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突破了以往偏重于文献和地方史志的局限。曾被定性为造船遗址的秦汉木构遗址也再次引起学界热烈的争论和探讨,“船台说”与“宫殿说”各执一词,引起巨大的反响。在《“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中,杨鸿勋、邓其生和程建军诸位先生对这座木构宫殿遗址做出了深入的定性分析,并提出了若干复原的可能性探讨。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南越国1号、2号宫殿遗址和相关遗迹的发现,使南越国时期的宫殿建筑成就逐步走入学界的研究视野。

另外还有曾昭璇等文化地理学者对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族属和小国做过文献的梳理与分析,麦英豪等多位考古学者对番禺城的范围和变迁以及南越国主要宫殿位置进行了研究,这是相关学科对岭南早期建筑发展研究可资借鉴的成就。

(2) 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个案研究较多,研究成果或表现为某些重点遗址的研究,如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南越王宫苑遗址等,或表现为某种建筑类型如民居陶屋的研究;而整体的综合梳理是粗略的,真正探寻岭南建筑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关乎演变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展,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脉络。从建筑的原始时代——洞穴居和巢居直至两汉时期,岭南建筑初步形成完整的建筑体系,而这一阶段的建筑史学书写框架尚属空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实物资料匮乏 岭南建筑萌发于史前时期,形成于秦汉,成熟于唐宋,至明清而演变。在湿热多雨的气候条件下,其早期木构均已毁坏不存,肇庆梅庵是岭南现存建于宋代的唯一木构建筑。因此至今为止的岭南建筑史研究,主要以地上遗存的古建筑为考察对象,集中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一段,早期建筑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

2) 文献史籍稀缺 由于岭南长期地处化外,学界早有岭南秦以前无史的说法。岭南地区古代一向被视为蛮夷荒服之地,有关先秦时期的史料极度匮乏,《史记·南越列

传》作为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南越国历史的资料，全文仅约 2400 字左右，而《山海经》、《淮南子》关于化外岭南族属的描述，因非正史，充斥大量神话传说而缺乏学术研究的足够可信度。因而探索史前和先秦时期的建筑历史，地下考古资料就显得特别重要。

3) 学域整合才刚刚起步 对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单纯依赖考古学或建筑学界的努力显然都是力不从心的，这种局面正如单翼难飞。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岭南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但遗憾的是，以往考古界每每专注于墓葬和器物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建筑遗址、遗迹的发掘，在发掘中未对空间信息的采集和保存给予足够重视，甚至由于缺乏建筑背景知识而难以对遗址现象做出正确判断。据已故香港考古学会会长莫稚先生介绍，在早年的发掘中，由于岭南地域土壤的特殊性和对建筑构造的不了解，甚至有将蚂蚁洞误认为柱洞的错误发生。近十几年来随着岭南聚落考古工作的开展，考古学家在驾驭大量考古资料基础上，对聚落形态研究前进了一大步，达到认识上的新飞跃，对较大规模聚落遗址进行了深入剖析，探索其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同时从聚落遗址的不同类型，进而探讨了不同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对聚落形态的影响。但是在这些工作中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建筑遗迹现象往往被当作不重要的部分从略，很多聚落遗址甚至连一张完整的总平面图都没有，只有零星或局部的柱洞或墙基槽，使考古报告不能很好地满足早期建筑研究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来说，建筑史学界的研究多局限于宋以后的实例，建筑史学家不参与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不熟悉田野作业流程，也不太容易接触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地面犹存的古建筑。由于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早期建筑研究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因此，建筑史本身视野其实应该有所转变，中国建筑史有必要走出其以“物类型”及“风格”为主的形式主义论述，在新的史学观指导下，吸纳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成就，拓展其研究之视野，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并展开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强调文化过程的概念，将隐藏在事件表象之下的长期趋势和机制纳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此方能掌握岭南早期建筑的特殊性和进化的线索。

考古学与建筑史学的隔篱，是导致早期建筑的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环节的关键所在。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去研究解决具体地区的历史问题是当今交叉科学时代的要求”^①，在这种大背景下，学科的整合特别是建筑考古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确立使岭南早期建筑有望进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

^① 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迎接交叉科学技术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年。

3. 研究方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建筑史的传统书写方式受到普遍的质疑。曼非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更藉《没有评论,只有历史》(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一文提出了“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历史,历史所关心的不应该是某物,而是人,特别是人类的文明。史家感兴趣的应该是建筑活动的循环,以及某一件建筑作品如何切合它所在的年代。不然,史家所做的就是强加自己的观点于建筑史上”^①的看法。由是,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亦应力图摆脱以建筑物为主之单纯的风格编年史书写,祈由建筑考古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在文化性视野中,从社会文化及营造过程之角度重新去认识“建筑”。

(1) 基于建筑考古学的史料辩证

岭南早期建筑研究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建筑史研究困境的缩影。众所周知,以土木结构为主的中国传统建筑并不耐久,加上朝代更迭时的破坏,隋唐以前的建筑实物几乎付之阙如。然而,大约早在东汉时代,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体系已然成形。当缺乏完整史料的困境遇上了关键性课题时,过去的研究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仅凭文献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古代建筑的演变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只有在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可靠而具坚实可理解性的建筑史学。

“建筑考古学”提出了建筑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实际地解决了古代建筑史学的困境,也对忽略空间史料的考古学本身有所助益。杨鸿勋先生指出:“从考古学来说,古聚落、古城市、古建筑遗址和古墓葬是同等重要的考察对象;就建筑史学而言,前期阶段缺乏或者没有遗留下完整古代建筑实物,唯有依靠考古学才能获得文献所不能提供的实物材料”^②。因此,建筑考古学的长处,不仅充实对缺乏实物的古代建筑之理解,也帮助了传统以“墓葬考古”为主流的考古学,开始注意“遗址考古”中的空间复原课题。建筑学与考古学的联姻开辟了一个崭新而有价值的学域整合的视野,对于同属中国建筑体系的东亚国家的古代建筑的考古学研究,它也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③。

在“建筑考古学”的研究视野下,本文对于岭南早期建筑的研究,除了从有限的史籍文献中追索答案,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上。严谨地考察和认识建筑遗址,为建筑史学的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实物形象史料,从而弥补岭南建筑史学探讨中的若干空白。

^① 转引自萧百兴:《准后现代平面城市的深度归反》,原文见 Tafuri, M. (1986) *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 in DBR, Spring, 1986: 8-11。

^②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③ 江柏炜:《建筑史学与考古学的融会》,第三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当然,合理而辩证地利用文献这一重要资料源,慎重整合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也是牵涉到早期建筑研究方向的紧要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研究。特别是文献中关于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某些“规制”的记载,尤需通过持续不断的田野工作及综合研究来反复校验、论证;而在相关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相抵牾时,应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对文献记载作审慎的分析。关于这一点,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已经成为历史研究者坚守的信条和最基本的学术规范。

(2) 基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前瞻

斯皮罗·考斯托夫(Spiro·Kostof)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建筑史该由何处、何时开始讲起?”他界定了何谓建筑,并据此作为其立论建筑史之出发点:

人类依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定居超过了100万年之久。如果“建筑”(architecture)一辞乃是意指着对环境所进行的有别于自然秩序、而有野心的塑造,那么,在这漫长时间中的大部分,人们对于这个字眼显然并无所知。然而,如果正如我们所建议者,建筑一辞只是简单地意指着“为了仪式之使用,而建造场所的行动”,其无疑是最初人类须要之一。事实上,可以说从自有人类开始,建筑即出现在所谓的“原始”的形式之中,即存在于自然真实的安布之中。因为只要吾人将大地想象成一片向所有方向无限延伸、巨大而没有任何特征的平原,将会完全没有建筑的存在。然而大地之上一旦出现了区隔延伸的分水岭和河流,一旦出现了隆起于各处的小山丘以及深埋于其中的洞穴,建筑之事务于焉就已经展开了。不管其之复杂度为何,那即是所有建筑所提供者,其标帜出了一个区域,使它与其他区域间产生了区别;其营造出了坚实的量体,吞没了如其巨骸般同样大小的空间;其甚且在我们的头顶之上树起了藩篱,以便建构出遮蔽性之空间。

上述之中的最后一项乃是最容易得见的。我们一般习于将建筑想象成一个遮蔽之处:一个用以住在其中的家,用以在其中工作的办公室和商店,从炎热拥挤的街道走进而用以礼拜的清涼场所。追求遮蔽的感官是一种本能,经由营建之手段以获致这种感觉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然而,建筑并非仅只是具有保护作用的遮蔽物。在寻求为仪式性活动提供场所的过程中,其必须展开对于无穷的界定,那即是说,去界定出空间,却不一定要将其之三个向度都完全地包被起来。其以两种特殊的方式来完成此一要求:透过境界线(circumscription)之使用以及重点(accent)之强调。在第一种方法中,其阻止并且模式化了地面的流动。吾人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作为边界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boundary),例如土地中之一个小区划或一个带有城墙的城镇即是。第二种

方式包涵了独立结构体之设立，藉由其相当的量体和高度，能够在没有分隔而持续延伸的开放空间中凝聚出一个焦点——此即是作为纪念物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monument）。^①

考斯托夫的大段论述，核心内容可归纳为：“建筑”一词，所指者非仅只是人类展现其野心，创造出与自然秩序分离之环境；“建筑”所指者乃是人类经营场所以供安身立命、以供仪式性使用的所有行动及结果，也就是说，自有人类始即有建筑之存在，建筑史亦当自此而始。建筑的起源，始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初发端。他也藉由“陈设与仪式”的特殊观看角度超越了既往建筑史偏于形式主义的取向，并带给了建筑学界从社会文化及营造过程之角度重新去认识建筑的无穷省思。

因此，无论是建筑史的研究，还是考古学的发展，都越来越认识到，历史研究不能将研究对象囿于描述性的风格类型学分析，而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生活文化史的脉络之下。诚如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指出，现在与过去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鸿沟，但仍应该透过证据、事实以重建过去的脉络，方有机会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图1-2）。俞伟超先生指出，对于考古学遗存和古器物、古建筑，研究的内容，必须从“物质底层、社会组织、精神文化”这三个因子进行探索。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而后者才是更高的目的^②。这正是如余英时先生所云：“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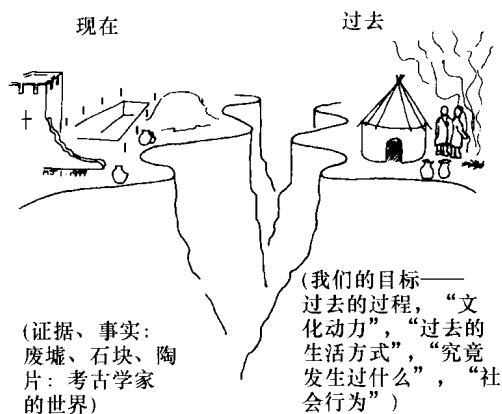


图 1-2 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鸿沟

（引自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

① Spiro Kostof: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Settings & Rituals》，台北唐山出版社翻印，1985 年。

②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③ 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小雅思想网，2006 年 9 月 1 日。